

外为己用：“找回国家”学说的思想引介与本土转化^{*}

胡 鹏

内容提要 学术思想的创新往往同时受到外部资源和本土传统的影响,本文以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兴起的“找回国家”学说为例,探讨学术思想创新中引进吸收和本土转化之间的关系。“找回国家”学说受到近代欧洲国家学说的影响,提倡关注国家的重要性,批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但在欧洲国家学说的历史教训及美国本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找回国家”学说虽主张关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却并未在价值上倒向国家主义,而是提倡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目的在于探究国家在经验世界中的状态及其影响。这种折衷主义降低了“找回国家”学说在本国学术界的思想冲击性,却提升了其在经验研究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 “找回国家”学说 国家理论 美国政治学 学术史 学术创新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5.05.010

引 言

学术研究如何进行创新? 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何? 现代学术分工和专业体制创立后,新的学术范式和思想往往由身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们提出。学术创新既是学者的自主工作,也深受政治社会情境的影响。身处全球化时代,跨地域和文化的思想交流与沟通愈加紧密。处理学术创新中的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议题。本文以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兴起的“找回国家”学说为例,探讨学术研究的引进吸收和本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总结美国国家学说的特点和演变趋势。

国家研究是比较政治乃至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以 20 世纪 80 年代“找回国家”学说的提出为关键事件。这一学说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1985 年编辑出版的《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一书是其标志性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政治文化变迁研究”(项目号:21CZZ012)的阶段性成果。

事件,本文因此将其命名为“找回国家”学说。在此之后,有关国家的研究蓬勃开展。以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出版的学科进展手册《政治科学:学科现状》为例,1983年的手册尚无有关国家(State)的专门篇章和目录,1993年出版的版本则出现了以“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标题的章节,2003年的手册更是将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的文章作为首篇,这一趋势显示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① 后续出版的其他政治学或比较政治手册中也纷纷出现有关国家的章节和内容。^② 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期刊上大量刊发有关国家议题的论文。^③ 国家研究成为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④ 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找回国家”学说并未在现实政治或外交政策中产生相应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思想界流行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历史终结论”,对外战略是民主推广而非国家建构,经济政策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推进自由贸易、放松国际和国内金融管制、降低国家干预等措施。^⑤ 近二十年来,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和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崛起,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⑥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与“找回国家”学说并无太大关系。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找回国家”学说并未在实际政治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如何解释其学术和现实影响力的显著差异?

与学术思想的传播相比,学术思想自身的内容是基础和前置性的,其内核和主张显著影响其传播范围及应用可能。中文学术界对“找回国家”学说并不陌生,《找回国家》一书已有中译本,倡导者的主要作品相继译成中文。“找回国家”学说提出后,美国学术界也出现了激烈的论战。本文既非观点引介,也不是论点辨析,而是将“找回国家”学说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通过对其思想内核的梳理展示其传承和创新之处,继而为该学说在学术和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本文的后续部分将兼顾结构性差异和时间性演变,从三个部分展开:首先介绍“找回国家”学说产生前的欧美国家学说大分野;再通过对“找回国家”学说关键论点的介绍,揭示其对欧洲国家学说的传承;最后聚焦讨论“找回国家”学说的本土转化和创新之处。

^① 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3; 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I. Katznelson, H.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② 如 C. Boix, S. Stok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参见 G. Munck, R.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2007), pp.5-31.

^④ 参见 D. King, R. C. Lieberman, “Ironies of State Build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n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3(2009), pp.547-588.

^⑤ 赵可金、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M. Cox, G. J. Ikenberry, Takashi Inoguchi,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李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欧美大分野: 国家学说的两大传统

在国家学说方面,欧洲和美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传统。欧洲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地。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封建体系在激烈的军事竞争格局下逐渐解体,绝对主义君主开始集权,推动现代国家的建立。^①除了产生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及经济社会条件外,欧洲的国家建构还与其内部的思想革命紧密相关。一批国家学说出现,从思想和价值上否定中世纪的政治安排,为现代国家正名。面对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混乱的政治局势,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直言: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外,不应有其他目标。无论是狮子的力量,还是狐狸的智慧,君主的作用在于使国家能对外抵御强敌、对内重建秩序。^②马基雅维利学说的落脚点在于敦促统治者扩大和保持国家的实力,此后国家逐渐被视为一个主权性的政治实体。英国的霍布斯通过一个思想实验论证了国家的必要性:自保的本能,以及对财富、荣誉、统治权或其他权势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求得和平,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利维坦。^③同处英国的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理解虽和霍布斯显著不同,但他同样认为人需要从自然社会走向政治社会,产生一个公正的裁决者即国家,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④

思想史学者斯金纳发现,在16世纪末之前,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欧洲的国家概念开始与统治者的权力区别开来,转变为单独存在的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国家的权力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成为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⑤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拥有主权,主权是赋予在一个国家之上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主权的出现是把国家同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标志。博丹认为主权只能单一,要么归属于国王,要么归属于议会或是民众,不存在类似于混合国家那样的政体。^⑥延续着博丹对主权的强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政治共同体或主权者源自神圣的契约性,国家因而是一个道德和集体的共同体。^⑦

近代欧洲国家学说的核心在于提出了主权学说。主权的存在成为实现和平、建立秩序和制定法律的基础。权力和法律的统一意味着政府的单一和统治权的垄断,具体表现为单一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安排。^⑧这种主权观为现实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绝对主义统治者

① 贾恩弗朗哥·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79页。

②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116页。

③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2—132页。

④ 洛克《政府论》(下篇),丰俊功、张玉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3—114页。

⑤ 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奚瑞森、亚方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⑥ 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102、106页。

⑦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25页。

⑧ 王建勋《驯化利维坦》,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把之前分散在特权个人和团体手中的统治权力集中起来,通过建立单一的政治机构在国家范围内制定和实施政策,组织成一个日渐有效能的机器并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和利益运行。^①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家取代封建公国,对国家的忠诚超越对教会和王朝的忠诚,同时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机关迅速发展并日趋合理化,常备军建立并扩大,税收制度得以普及和完善。^②国家主权成为法律等规则的正当性来源,宪法和法律的通过需经过主权者同意。德国思想家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中将国家界定为“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团体”。^③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拥有属于自身的机构和人员,并在其自己的领土上处于至上的地位。^④

19世纪的普鲁士及统一后的德国在国家必要性和作用方面提出了新观点。首先,德国崛起的国家主义学说将国家视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而非社会通过协商和契约理性建构起来的。黑格尔认为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并不相同,家庭和市民社会关注私人利益,服从的是特殊性原则,国家则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服从的是普遍性原则。^⑤对于英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及其具体表现议会政党制,德国内部产生了强烈的拒斥情绪,其中尤以魏玛时期的右翼国家主义者为代表。这批人反对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及团体自私主义基础上的体制无法容纳整个民族的共同体。在他们看来,魏玛体制中的议会和政党消解了德国的国家性,国家变成了一个披着国家外衣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由经济团体和协会谋取私利的舞台,政府降级为党务委员会。国家在这些人眼中是一个高于政党、享有自治权的机关,是一个依靠自身实力和权威的组织。他们呼吁将国家从社会性力量中解放出来。^⑥施米特认为区分朋友和敌人是政治的独特基础,国家则是划分敌友、决定战争的政治统一体。^⑦施米特反对将国家视为利益竞争的场域的观点,认为国家并不是社会利益的服务者,相反其凌驾于社会之上,是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⑧国家不仅是一个分配和实施权力的机制,也是现实思想生活的意义所在,个人的生命意义只有通过汇聚为国家的整体才能得到体现。^⑨接着,作为拥有自己的机构、人员和场域的独立实体,国家应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李斯特认为,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不可少,应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扶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⑩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韦伯同样认为国家应关闭边界,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⑪国家利益一词开始出

① 贾恩弗朗哥·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页。

②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页。

③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5、61页。

④ 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2—392页。

⑥ 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12、125、153页。

⑦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⑧ J. P. McCormick “Fear, Technology, and the State: 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and the Revival of Hobbes in Weimar and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Political Theory*, Vol.22, No.4(1994), pp.619-652.

⑨ 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⑩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6—160页。

⑪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6—98页。

现,国家权力和政策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国家学说与近代欧洲的国家学说有着鲜明的差异。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及主权至上原则的确立与其政治历史密切相关,包括中世纪长期的封建主义历程、教权与王权的复杂关系等。美国则是一个主要来自于英国的清教徒定居者建立的新国家,没有类似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亨廷顿指出,16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成分恰恰是当它在母国被摒弃时被移植到北美新世界,并在那里生根、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这使得欧洲的主权思想,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绝对主权抑或国会至上等观念,在美国都没有市场。即使承认主权在民,何者代表人民也含混不清。美国的主权在亨廷顿看来是一种隐伏的、被动的和终极的权威,而非积极的有活力的权威。^①

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革命在强化了上述原则的同时,塑造了美国政治的新传统。历史学者方纳认为贯穿美国历史的关键词是自由,从一开始,对自由的倾心和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② 自由的基础是权利意识。美国革命塑造了新的权利观,它从被批准授予的特权变成自然赋予的、基于理性和正义的基本权利。^③ 这代表着国家和个人权利关系的改变,权利不是国家授予的,而是先于国家的产物。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有造物者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之相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需要得到国家的守护,国家权力不能染指。英国殖民当局征税以及镇压反抗的历史记忆使得美国民众对于暴政和专制抱有深深的恐惧。在美国革命期间传播甚广的著作《常识》中,潘恩写道: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④ 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成为贯穿美国政治的一个中心话题。^⑤

与欧洲在主权学说的指导下建立单一制国家不同,美国立宪者们设计的是一个权力分享和制衡的复合共和国。联邦和州之间是分工协作而非上下级关系。参与立宪的麦迪逊曾言: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本质都是人民的不同代言人、不同的受托者,被赋予不同的权力。接着,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内部权力集中,尤其是立法权的过度集中,立宪者们在联邦政府内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相互独立和制衡。麦迪逊总结道,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在两层分立的政府之间分配,然后再把两层分立的政府各划分为三个分立的部门。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我控制。^⑥ 在这样一个共和国,任何政府的主权或权力都是有限的,不同政府之间分享主权,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权力,这与单一共和国形成鲜明的对照。^⑦

最后,美国革命的另一遗产是将自由与平等相联系。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意味着政治权利、经济机会以及社会条件的平等。^⑧ 托克维尔指出,他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

①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81、86—87页。

②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1页。

③ B.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VII.

④ 托马斯·潘恩《常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页。

⑤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1—92页。

⑥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49—350页。

⑦ 王建勋《驯化利维坦》,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⑧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1页。

新鲜事物,其中最吸引他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①在革命后,自由的洪流扫荡了世袭制的原则、长期奉行的尊卑贵贱习俗以及对政治社会的陈旧限制。^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平等具象化为大众参与。麦迪逊认为新的共和政府的权力必须直接或间接来自人民大众,在现实运行中需保障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③托克维尔对于美国地方自治印象深刻,他写道: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方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方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而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也微乎其微,并且薄弱得很,何况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④亨廷顿发现欧美政治发展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远比美国发生得更早、更彻底,美国的特殊之处则在于最先实行了广泛的政治参与。^⑤

以欧为师 “找回国家”学说的提出

在内特尔(J.P.Nettl)看来,相对于欧洲,美国的“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塑造了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的忽视。^⑥美国政治学产生于进步主义年代,强调以超越党派的专业研究来产生稳定和促进自由主义政体的知识。^⑦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发现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缺乏有关国家的系统研究,但他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美国不需要学习具有强国家传统的法国和普鲁士,因为不受约束和自由远好于奴性和有条理。^⑧在威尔逊等人的影响下,美国政治学研究关注形式化制度、公共行政和法律在维护本国自由主义政体中的作用,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交往,关注利益的代表、公共舆论和选举。卡茨奈尔森(Ira Katznelson)总结道,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是维护一个自由主义国家,防止自由政体变成君主制和非自由的帝国政体。其研究有着两大内在特点:一是探寻能够限制和约束掠夺性国家权力的基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规则,二是让国家服从社会成员的意志和选择。^⑨

“找回国家”学说的旗手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与埃文斯(Peter Evans)、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共同编著的《找回国家》一书的开篇中指出,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由结构功能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结构功能主义中的国家是一个连接利益和意见表达输入及政策输出的中间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是利益团体竞争影响力的竞技场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页。

②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7页。

③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58—64、255页。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1页。

⑤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8、104页。

⑥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1968), pp.559-592.

⑦ I. Katznelson, H. V. Miln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s State and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I. Katznelson, H.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4.

⑧ 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2, No.2(1887), pp.197-222.

⑨ I. Katznelson, H. V. Miln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s State and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I. Katznelson, H.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p.5, 9-10.

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则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工具。^① 斯考切波将其概括为“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其研究重点关注立法部门、选举以及民众的公共参与、利益集团的活动。国家极少出现,其替代物政府被描绘成由行为者或者行为者群体的活动和互动构成的程序。^② “找回国家”学说对这样的研究范式发起挑战,呼吁在学术研究中重新关注国家,提出有关国家的新论述。

首先,“找回国家”学说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本体论基础的现实存在,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在1968年发表的题为《国家作为概念变项》的开创性论文中,内特尔指出,国家在政治社会分析中日渐边缘化,不被重视。在内特尔看来,国家具有如下特点,使其不应被忽视:(1) 国家是包括各种职能和结构的集合体,拥有制度化权力的国家与个人权力相区别;(2) 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看门人,对外声称拥有主权且独立处理外交事务,国家因而与社会相区别;(3) 国家在国内领域同样具有独特功能,拥有属于自身的政府机构和官员,这使其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或组织;(4) 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将其从特定的结构附属物或纯粹的自主性强调中解放出来。^③ 斯考切波呼应内特尔,认为居于国际和国内的交界处使得国家的特殊职能在于维持国内秩序以及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国家精英和支配阶级由此产生区别:支配阶级关注经济利益,国家精英则关心国家安全。^④ 曼(Michael Mann)认为既有认识将国家视为社会的附属品,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国家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在疆域上活动的组织,国家权力关注和强调疆域性,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则不关注疆域,反而试图消除边界。为了控制特定疆域,国家需要有一个中心化机构,同时将权力扩散到全部疆域之上。曼认为“领土中心化”是国家的独有特点,这也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双重面相:国内层面处理的是国家与经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国际层面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⑤ 很明显,无论是对强制性组织还是对疆域属性的强调,都代表着欧洲尤其是韦伯式国家观的回归。在获得独立存在的地位后,“国家”一词在研究中往往与社会、经济等现象并立。如曼和米格代尔(Joel Migdal)分别以《国家、战争与资本主义》《强社会与弱国家》为书名探究欧洲和新兴国家的国家建构。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就是建立韦伯式的国家,他后来提出有效国家概念,视其为政治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⑥

接着,“找回国家”学说关注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动者的作用。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斯考切波认为无论是沃勒斯坦对于世界体系的分析,还是摩尔对民主与专制起源的跨国比较研究,

^①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37.

^② S. J. Eldersveld, A. Heard, S. P. Huntington, et al., “Research in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6, No.4(1952), pp.1003-1045.

^③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1968), pp.559-592.

^④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0.

^⑤ M.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1984), pp.185-213.

^⑥ F.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p.15-16.

都忽视了国家或者无法解释国家的兴起。沃勒斯坦“经济生产状况决定国家能力强弱”的观点无法解释欧洲东西部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处于国际经济分工核心的英国和尼德兰没有产生其预测的强国家，处于边缘的法国和瑞士却出现了强国家。^① 在研究社会革命的专著《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斯考切波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她认为现有社会革命的解释忽视了国家的潜在自主影响：社会革命的爆发与国家精英应对外部竞争、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密切相关。^② 曼将这种对国家自主性的关注视为一种“精英主义式的国家观”，国家精英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权力，成为行动者。这种视角重点关注地缘政治、国际政治、战争和备战筹资的影响。^③ 这无疑也与马基雅维利、李斯特、韦伯等欧洲国家学说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后续的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国家对国际和平和秩序、经济增长和分配、个体地位和认同等议题上的影响。

最后，“找回国家”学说也关注国家作为一个结构的影响。国家在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行为者的同时，其自身也是内特尔笔下的复杂集合体。斯考切波指出国家需要被视为一个宏观结构，包括行政、治安和军事等多种组织，是一个复杂体系。^④ 国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自主性的国家官员推出政策及其行为，同时表现为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构造”对一地政治文化、行为和政策议题的影响。^⑤ 曼将之视为与精英主义国家观不同的制度主义国家视角，国家被视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运行逻辑的结构。^⑥ 斯考切波指出此观点受到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影响，她将此命名为与韦伯式国家观相区别的托克维尔式国家观。^⑦ 以美国为例，美国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分散，为社会力量影响公共政策提供了诸多空间，这也导致国家自主性不为人所关注。^⑧

“韦伯式国家观”强调国家及其组成人员有意识的作用和影响，“托克维尔式国家观”关注作为复杂结构的国家产生的无意或意料之外的影响，“找回国家”学说的两大核心论点均展现了其对近代欧洲国家学说的传承。这源于大西洋两岸长期存在的学术思想交流。19世纪末

① T. Skocpol,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4 (1973), pp.1-35; T. Skocpol, “Review of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 No.5(1977), pp.1075-1090.

②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4-33.

③ M.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8-52.

④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1-32.

⑤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37.

⑥ M.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2.

⑦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31, No.2(2008), pp.109-124.

⑧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

开始,欧洲学者大量移民美国,显著影响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美国学术研究。“找回国家”学说的倡导者内特尔、曼、鲁施迈耶皆在欧洲接受教育,之后转往美国任教或将作品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对于在美国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斯考切波、埃文斯、米格代尔等人而言,欧洲国家学说著作的翻译和引进是其灵感的来源。托克维尔的主要作品在19世纪即有英文译本。随着帕森斯在1947年将韦伯的主要作品翻译成英文,韦伯学说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①斯考切波、埃文斯和蒂利(Charles Tilly)毕业于帕森斯长期任教的哈佛社会学专业,在读书时代接触到韦伯的学说实属自然。斯考切波在个人访谈录中即提到:她在哈佛念研究生时曾在课上阅读和接触过包括韦伯、托克维尔在内的欧洲社会思想学说。^②她也坦言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韦伯、托克维尔、欣泽(Otto Hintze)等欧洲思想家的影响。^③有趣的是,深受韦伯影响的帕森斯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并不重视国家,同样阅读韦伯的斯考切波等人则力图将国家找回。

欧洲的国家学说传入之余,其国家建构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也获得了“找回国家”学说的关注。内特尔的文章多次介绍发生在欧洲的状况,法国在他看来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典范。^④在斯考切波笔下,欧洲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祥地,也是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之所。欧洲并未诞生大一统的体系,反而出现了一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体系。在这种环境中,国家不是经济主导阶级追求经济收益的工具,而是具有疆域领土控制能力和参与国际政治军事竞争的独立个体。^⑤国家何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者?内特尔、斯考切波与身处德国的李斯特的观点高度类似,均将其归结为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体系中,是国际和国内看门人的这一特点。^⑥“找回国家”学说的提倡者同时认为欧洲的政治历史经验非常重要,视野的扩大为后续大量有关欧洲及全球各地的国家建构的经验研究铺平了道路。

从规范到经验 “找回国家”学说的本土转化

如上所述,“找回国家”学说深受近代欧洲国家学说的影响,主张将国家视为一个实体存在,关注国家的自主性和潜在影响。而欧洲的国家学说在美国落地生根之际,也经历了本土转化,最终两者产生了鲜明差异。

首先,欧美的国家学说虽然在国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观点相似,但其目的存在显著不同。欧洲的国家学说与现实政治关系紧密,学说提出的目的往往在于改变和影响现实。马基

^① M.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1984), pp.185-213.

^② G. L. Munck, R. Snyder, *Passion, Craft,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7, pp.654, 656.

^③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ix.

^④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1968), pp.559-592.

^⑤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0-32.

^⑥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7页。

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期冀统治者能组织起属于自己的军队,改变意大利内部支离破碎、对外被强权蹂躏的状况。面对英国内战的状况,忧心忡忡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试图为重新恢复秩序提出一条道路,建立一种能够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博丹的主权学说将主权的存在视为一个良好运转的國家的基础,为國家独立的、超越一切世俗与宗教限制之上的权力提供逻辑上的论证。^① 韦伯指出民族兴盛和衰弱是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的过程,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就能获得胜利。他批评德国的市民阶级只醉心于眼前的成功和自身的群体利益,充斥着“政治厌倦症”,呼唤政治成熟群体的出现,以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② 接着,出于影响乃至改变现实的愿望,歐洲的國家学说往往具有强烈的规范色彩。具体而言,这些学说在论述中往往会树立鲜明的对立面,通过批判和否定对立面来增强自身主张的说服力。霍布斯的《利维坦》批判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政治观,洛克和卢梭的学说挑战的是以血缘和家族继承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学说,李斯特的著作则花了大篇幅批评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施米特批评自由主义试图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又从知识的角度把敌人变成论争对手,从而忽视政治的本质在于划分敌我,而國家正由此产生。^③

强烈的规范性及影响现实的倾向使得不少歐洲國家学说学者站在國家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成为鲜明的國家主义者。霍布斯指出:为了使人民求得安全,主权者拥有订立规章、财物所有、官吏选拔等诸多权力。^④ 博丹与之类似,主张國家内部必须存在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施米特认为划分敌友的政治性决定是首要的,它决定了一个國家能否生存下去。只有在这样的决断做出后,后续才有其他次要的政治现象(如教育、公共政策)出现。^⑤ 强烈的國家主义倾向在德国造就了一批國家法学家,其认为若没有某种规范性的國家思想或者关于政治现实的知识,根本就没办法工作。^⑥ 國家法学家强烈批评法学的实证主义,因其限制了法学家的思考范围,使其概念和思想无法超过本国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成为当下现实的辩护人。^⑦ 这种反实证主义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國家内容绝对化,来质疑多元主义下必然形成的平衡性政体,最终导向的是一个独立于社会进程之外的独裁國家,或者將國家定位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國家或一个自我标榜的社会國家。^⑧ 这些反民主思想最终成为魏瑪共和國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找回國家”学说的学者并未传承歐洲國家学说的如上特点,这与歐洲二战的历史以及美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和现状有关。这批学者对二战的惨烈依然印象深刻。曼指出德国的國家学说將國家视为一个物理实体,视其为社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量。这些看法很快与政治现实结合在了一起,國家学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对國家权力的神圣化以及法西斯主义相

① 唐世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6—187页。

② 马克斯·韦伯《民族國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4—119页。

③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38页。

④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7—139页。

⑤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8—39页。

⑥ 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瑪共和國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⑦ 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瑪共和國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⑧ 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瑪共和國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结合,导致了二战的灾难性后果。这样不适的历史经历使得美国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拒绝承认国家的潜在自主性。^①与此同时,斯考切波认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加自由政体的模式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模式,成为值得推广的典范,这进一步导致国家被忽视。美国学界对国家的重新关注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的政治经济挑战有关。不过这些挑战都是短暂的,美国并没有丧失其国际地位,这与20世纪初作为赶超国家、面临巨大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德国完全不同。相反,美国在二战后摆脱孤立主义,更为关注其他地区的状况。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和支持下,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兴起。对国家作用的关注出现在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区域国别研究中。^②

“找回国家”学说也有其批评的对立学说,不过它对“以社会为中心”研究范式的不满是学理性而非现实政治性的,即其无法解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现象。新学说提出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美国政治,而在于增进研究者对国家概念的了解、增进对全球各地国家的现状和演变的探索。内特尔明确指出:他的目的在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国家的关注,将其带回社会科学研究中,为其争取一席之地,希望有助于人们观察不同地区的状况。^③曼同样不认为要回归德国传统,因为德国的国家学说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还原主义,国家只是“有形的强制力化身”,国家权力与军事权力混为一谈。这种强烈的政策倾向反而不利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学理讨论让位于现实影响。^④

与欧洲的国家学说聚焦“主义之争”、提出“怎么办”的现实政治主张不同,“找回国家”学说关注经验世界的差异和变化,聚焦“为什么”的问题并予以解答,试图在分析和解释世界各地的状况上贡献自己的概念工具和分析视角。具体而言,“找回国家”学说提出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两个分析概念。国家自主性关注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具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国家能力则聚焦国家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成效。借助这两个概念工具,学者们得以关注和测量不同地区的国家状态,探讨国家能够出现自主性的条件、影响国家能力强弱的因素等具体议题。这两个概念也出现在一系列中层性质的经验研究中,如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互动。^⑤与此同时,国家作为一个结构也在无形中塑造经济社会状况,这使得对一国内部国家结构、政治制度的分析成为必要。如后续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有关美国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的研究逐渐兴盛。

斯考切波在总结部分写道:找回国家的目的并非为了提出一个新的国家学说,而在于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现代世界中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具体提升对国家结构和

① M.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1984), pp.158-213.

②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 6.

③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1968), pp.559-592.

④ M.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1984), pp.158-213.

⑤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

能力的概念化、解释国家如何形成和组织,以及探索国家与社会群体的互动产生何种影响。“应然性”和“怎么样”转变为“实然性”和“为什么”,研究目的不是影响现实,而是提升对国家结构和国家行为的科学理解。^①《找回国家》一书的结论章标题为“走向对国家更为充分准确的了解之路”,鲜明地展现了这一倾向。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米格代尔指出,“找回国家”学说提出后的国家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包括个案研究和大样本研究等多种方法的使用、从单一的国家模板到关注不同国家的异同,以及从单一范式走向多范式结合。^②

在思想倾向上,“找回国家”学说也没有倒向国家主义。其反对“以社会为中心”,却不主张“以国家为中心”,而是提倡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即“找回国家但不踢开社会”。这种折衷主义与“找回国家”学说的经验研究导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经验研究开展的前提是研究者自觉的价值中立,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预先的价值判断都会干扰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分析,要么忽视国家,要么忽视社会。^③而现代国家产生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社会之中,其成长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与既有社会权威掌握者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现代国家随着欧洲强权的扩张扩散到了其他地方,当今世界也无法忽略国家的存在和影响。王裕华近年的一篇评述型文章以“国家在社会中 2.0”为标题介绍国家研究的新进展,可见当前美国的国家研究依旧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视角的延长线上展开。^④

小 结

学术研究的创新、思想和文化的变迁一直是知识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知识社会学在知识生产的议题上存在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社会结构决定知识生产,另一种则强调个体具有能够建构知识的主动性。在内特尔眼中,概念的含义总是受到意识形态以及地域的影响。^⑤萨义德曾言: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⑥因为历史经历和政治文化的差异,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国家观,这也影响了国家议题在两地思想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不过这样的差异并非不可改变,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身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能意识到本地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影响,通过有意识地打开视野并引介新的思想和观念,引发本地学术研究乃至思潮的变迁。

“找回国家”学说的提倡者是一群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追求创

^①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viii, 28.

^② J. Migdal “Researching the State”, in M. Lichbach, A.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62-192.

^③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

^④ Y. H. Wang “State-in-Society 2.0: Toward Fourth-Generation Theories of the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4, No. 1(2021), pp.175-198.

^⑤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1968), pp.559-592.

^⑥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页。

新是其职责所在。这批学者在对美国学术研究的既有状况有着深刻体察的同时,也对欧洲的国家学说有着了解和认识。在《找回国家》的开篇章中,斯考切波用“欧陆传统的回归?”作为一个小节的标题,不过她在正文中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能够明确发现近代欧洲国家学说的影响。通过将国家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和行动力的主体、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结构两个论点引入,“找回国家”学说使得包括韦伯和托克维尔在内的欧洲国家学说在美国落地生根。国家重新回到政治学研究的聚光灯下,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热门话题。“找回国家”学说的出现因而成为文化思想交流的一个例子。

于君方曾指出:一个文化也许会被外来事物所吸引,却也不由自主地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①外来思想的传入往往会经历本土化,其中的关键在于与本地既有的主导文化规范之间的互动。与中国的儒家学说传入日本被选择性吸纳、印度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变成汉传佛教类似,欧洲的国家学说到了美国也经历了本土化:其从一个改变和影响现实的规范学说变成一个理解和解释现实的学术视角。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概念、国家作为结构的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分析和观察全球各地在不同时代出现的国家形态,推动了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议题的崛起。一些学者认为“找回国家”学说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引起了“范式性的革命”,^②这无疑言过其实。“找回国家”学说的经验研究导向本就与美国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一脉相承。进一步,“找回国家”学说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重视国家,却在价值倾向上克制对国家作用的推崇,提倡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这与美国长期以来主张国家与民众互动的政治文化同样不谋而合。因此,“找回国家”学说并没有产生库恩所说的范式创新,只能说是“茶壶内的大风暴”。这种折衷主义降低了“找回国家”学说在本国学术界的思想冲击性,却也提升了其在经验研究中的影响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其学术和现实影响力的显著差异。

作者简介:胡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成 婧)

①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陈怀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页。

② 如 D. King, R. C. Lieberman, “Ironies of State Build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n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3(2009), pp.547-588。

the U.S. Meanwhile, numerous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South have ascended rapidly, seizing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are now seeking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lthough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the U.S. and Europe initially held structural power advantages through postwar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y now face growing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fiscal deficits, and social divisions,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Mechanisms such as South-South agreements, BRICS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evolution are propelling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o rapidly catch up in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apacity, thereby intensifying the pressure to restructure the U.S.-led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Moving forwar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ll likely coexist, and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aspira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will become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U.S. in shaping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n it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9.AI-Driven Paradigm Innovation in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Liu Taoxiang* • 146 •

With the breakthrough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toward an AI-driven paradigm.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bridging econom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ntegrates numerical computation,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exhibiting pronounced methodological diversity. It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an early stage characterized by numerical computation of equilibrium theory, a middle stage centered on complex system simul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ge marked by deep integration with AI. AI technologies—particularly large language models based on deep learning—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computational frontier of economic systems, bringing revolutionary innovations to data generation mechanisms, research domains,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This shift fosters an organic synthesis of theory-driven and data-driven paradigms, giving rise to a new mode of “self-generating knowledge”. Although the intersection of AI an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it is likely to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iscipline’s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10.Adaptive Absorption: The Ideational Diffusion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ory *Hu Peng* • 154 •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ideas often aris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local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ory, which emerged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in the 1980s,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ideational diffusion and local adaptation in academic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it reveals that the theory, influenced by modern European state theory, emphasizes the state’s role and critiques society-centered research paradigms. However, shaped by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European stat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theory avoids advocating statism, instead promoting a balanced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is eclecticism tempers its ideological impact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but enhances its influence in empirical academic research.